

複雜式避險策略研究： 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的安全策略選擇*

楊三億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摘要

中小型國家在當前國際體系下的數目眾多，這些國家有各自國家利益與偏好，因此理解這一群國家的策略選擇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國際關係發展。本文研究設計有以下幾個特色：第一，本文以歐洲的中小型國家為個案研究標的，擇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三國進行分析，這三國分別位於當前東／西歐對立環境的最前沿，透過觀察這些國家可理解地緣斷層帶上中小型國家面對歐、俄強權競爭時的策略選擇。第二，由於中國近年不斷向歐洲拋射影響力，歐洲國家明顯感受到中國政策影響，歐洲的中小型國家傳統上面對歐／俄兩強環境已出現變化，由於中國不斷崛起過程帶來的影響力，將中國當成一個重要的歐洲安全境外行為者是必要的，當國際環境的強權數目大於兩個時，中小型國家避險策略將趨複雜化，傳統的策略選擇模型需隨之調整。

本文研究指出以下幾點初步觀察：首先，過往相關文獻指出加入軍事聯盟後中小型國家幾無避險空間，不過透過觀察可以發現，在抗衡、扞

* 作者衷心感謝兩位審查人剴切之審查意見，收穫良多；同時也非常感謝執行編輯與編委會提供補充意見，使本文能在結構上更加精采，在此一併申謝。

從、避險的多重策略中，避險策略受到高度矚目，因為避險主要目標以避免戰爭兼保護本國主權為要，有著很強的中間策略取向，中小型國家即便在加入軍事聯盟組織後仍可能透過多重途徑達成避險目標。其次，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三國策略選擇分別代表了轉出、轉入與校正的三種模式，這三種模式分別說明避險策略的複雜樣貌。最後，本文同時指出作為新興的境外行為者，中國對歐洲安全的影響力正持續上升。中國作為繼美、俄兩國後重要的第三方存在，三國間如何相互調適及歐洲國家如何看待中國，將是未來歐洲安全發展的重要關鍵所在。

關鍵詞：複雜式避險策略、立陶宛、匈牙利、土耳其

* * *

壹、前言

在所有中小型國家外交策略選擇中，抗衡與扈從是策略選擇最常被提起的類型，因為這兩種策略選擇最容易被辨認，在國際關係的互動過程中也很受矚目，中小型國家抗衡的終極表現即為軍事同盟，透過強權提供安全保證的方式以對抗敵對強權，並在經濟層面上也對敵對強權採不友善態度；相較於抗衡，扈從是針對敵對強權採取的妥協作為，以雙邊軍事與經濟合作為政策主軸，其目的是分享敵對強權的誘因（陳麒安 2014；鄭端耀 2003；Snyder 1990；Walt 1987；2009）。無論抗衡或扈從，這一群組國家選擇的策略都說明中小型國家受限於國際權力結構安排而採取相對應的政策。避險與抗衡／扈從不同，避險策略代表這一群國家期望在緊繃的權力結構下維持自主並展現靈活策略，避免將本國的安全與經濟果實與單一強權緊緊相繫，採取的是一種分散風險的策略作為，這一種策略作為顯示中小型國家嘗試回應國際體系，希望維持較高的自主行為能力。本文選擇以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三國作為觀察核心，理解這三國避險策略變化，挑選這三個國家主要有以下幾點考量：

第一，從強權競爭角度來看，這三國分別位處歐洲大陸強權的交界處，三國皆位於歐洲東／西強權間競爭地帶，自冷戰時期開始這三國分屬前蘇聯加盟

共和國、蘇聯衛星國與蘇聯敵對國，這三國並皆陸續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細緻觀察這三國可發現，在近期面對中國帶路倡議與俄烏戰爭等重要國際事件的回應上，地緣相近的三個國家策略選擇呈現多種變化途徑，現行分析框架較難說明這些國家的策略表現。

第二，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這三國都屬於中等經濟發達國家，立陶宛人口約280萬人、人均GDP約為25,000美元；匈牙利人口約1,000萬人、人均GDP約為20,000美元；土耳其人口約8,300萬人、人均GDP約為8,000美元，這三國人口與GDP雖略有差距，不過把經濟發達程度與人口數相較後即可發現，這三國剛好顯示當前中小型國家的衆多不同類型所在。

第三，從地緣角度來看，這三國還具有以下幾個特色：（一）以烏克蘭為核心，這三國分別位處環繞烏克蘭北部、中部、南部三種地緣政治位置，剛好可以適切的觀察俄烏戰爭對這三國的影響。（二）這三個國家分屬波羅地海、中東歐與黑海海域三大次區域，這三大次區域是歐盟與北約與俄國交會的最前沿，屬於強權戰略競爭最激烈處。（三）這三國也是中國帶路倡議進入歐洲的入門國家，這三國很快地與中國帶路倡議建立聯繫、並且迅速地做出積極且具體的回應，因此也是觀察中國影響力的重要區域。

綜合來看這三國所處的地緣位置與綜合國力，可以發現這三國呈現出幾個有意思的可比對處：第一，雖然這三國各自在經濟、土地、人口等基本國力面向上有所差異，但相互抵銷的結果讓三國綜合國力差異相對縮小；第二，即便綜合國力差距小，不過立陶宛土地面積與人口仍屬三國中較小型之國家，小型國家的易毀性高，經常會展現出對國家存亡的高度恐懼感，也就連帶導引出外交政策容錯空間小，導致這一類型國家的政策通常會選擇緊跟那些願意提供安全保證的強權；反觀土耳其人口最多，經常有扮演區域領導者的雄心壯志，因此較易與強權保持距離，展現的是一種若即若離的政策選擇模式。匈牙利介於立、土兩國之間，屬於彈性靈活的政策選擇模式。

貳、避險策略理論背景及其運用

避險（hedge）一詞起源甚早，一般以為該字從古英語hecg而來，該詞本

意為籬笆，將hedge動詞化之後就成為閃避、躲避之意，後轉化為避免自己遭受損失的意義（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edge），因此避險一詞很早就有躲避風險的概念、也就是在風險到來之前先行採取措施之意。避險概念後來轉引至資本市場後被大量運用，因為資本市場的特色就是透過投資行為來建立收益，但投資行為卻常因各式環境因素出現變化（如天災或戰爭等因素）而造成供需失衡、連帶讓商品價格不斷波動，此種波動帶來的收益損失可能非常巨大（Maitra et al. 2022, 1-27; Tessman and Wolfe 2011）。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避險策略運用也相當廣泛，而且分析時多半將此種策略運用置放在一個較大的研究向度上，也就是從整體面向觀察中小型國家的策略選擇。過往多數研究中小型國家外交策略選擇的起點都是從以這些國家面對強權如何回應作開端，研究的初始是這一群國家面對敵對強權時選擇抵抗還是順從？此種選擇有沒有自主性？除抗衡或避險外，哪一種中間策略可以避免極端？

相關文獻指出在條件配合的情況下，中小型國家選擇抗衡的機會較大，華爾滋（Kenneth Waltz）認為國家會傾向採取對抗強權、而非屈從策略的思維是國家以維護獨立自主為最高選擇，因此採取了抵抗強權的作為（Waltz 1979）。另一種從權力大小的現實主義角度切入，假定中小型國家選擇加入較強大的聯盟，此種選擇被視為扈從策略；但如果中小型國家選擇加入較弱小的一方，此種選擇則會被視為抗衡。這裡的分析差異在中小型國家選擇聯盟的對象出自於權力大小差距的憂慮，如果權力差距懸殊，基本上採取抗衡的可能性較低；相對的，在有限的差距範圍內選擇抗衡的機會則較大。但如果將分析視野轉向為以威脅來源作為區分時，這一群國家選擇的圖像也就有所不同，假設以威脅來源作為中小型國家組成聯盟選擇的標準，選擇與威脅來源組成聯盟的策略便稱為扈從策略。瓦特（Stephen Walt）認為國家之所以傾向於抗衡對手，最關鍵處在於該強權所帶來的巨大威脅，對手實力大小與差距並非主要考量（Walt 1987）。威脅來源雖然也與國家大小的權力差距有關，但政治菁英態度與民衆認知卻扮演重要的中介變項，讓這一群國家重新詮釋強權對本國的友好或敵意程度。

採取抗衡或扈從的選項對中小型國家面對強權而言，或許是保存國家主權、或者是獲得強權提供的經濟誘因等考量，不過這些考量的代價都相當大，

前者代價在於提高戰爭風險並可能遭受滅亡；扈從代價則在於使本國淪為從屬地位、由敵對強權決定本國政策走向。單純抗衡或扈從策略風險相當高，因此多數國家可能偏向採取折衷策略作為趨避風險方式。避險策略經常出現在各式場合使用，較日常化用語如兩面討好、平衡策略、兩手策略、中間策略等用法，都顯示避險策略一直存在多重樣貌並且深入民衆心理。

當前許多理論都有避險的概念，戰略三角理論即是一例，吳玉山院士從三方行為者的友善或敵對方式互動進行排列組合，將不同類型下的角色區分為樞紐（pivot）、朋友（friend）、夥伴（partner）、側翼（wing）、敵人（foe）及孤雛（outcast）等6種（吳玉山 1997, 177-178）。在吳院士的分析框架中，樞紐是所有三角類型中的最佳位置，扮演樞紐的行為者與另兩行為者的互動保持友好關係就是屬於典型的兩面討好策略。吳院士進一步將三角理論運至俄烏戰爭也同樣合適，歐洲國家對俄國反應強度即是戰略三角的延伸關係（吳玉山 2023, 317-326）。另外吳崇涵將避險視為兩種類型，第一類是將軍事安全與經濟策略混合使用，也就是中小型國家面對強權的多面向交互使用策略；第二類是結盟行為，也就是將中小型國家與強權結盟行為的強弱視為避險策略的運用，結盟行為越強代表避險策略越弱，反之亦然（吳崇涵 2018, 516-519；陳麒安、吳崇涵 2022, 1-49；薛健吾 2016, 121-178）。郭清水（Cheng-Chwee Kuik）對小型國家避險策略的定義是：1. 堅持不選邊或被鎖定在嚴格的聯盟中；2. 試圖採取相反或矛盾的措施來抵消跨領域（安全、政治和經濟）的多重風險；3. 傾向於多重關係且預留後路（Kuik 2021, 302）。

前述關於中小型國家與強權結盟的行為是否符合避險策略，學界對此看法略有不同，較早期的學者認為結盟不是決定抗衡或扈從的唯一標準，加入強勢一方或弱勢一方聯盟、或者以威脅來源作為選擇結盟對象才是策略選擇的標準。新近學者採較嚴格定義者認為一旦與強權結盟，那麼就無避險空間存在；但採較寬鬆定義來看，中小型國家即便與強權結盟，但在結盟體系內仍有空間極力爭取多重手段的避險策略。本文認為當前國際環境已脫離冷戰時期兩極對立體系，當前諸多軍事聯盟組織雖由冷戰時期延續至今，但其任務目標已有極大轉變，後冷戰時期的北約目標由大規模的戰爭準備轉向邊界安全、反恐、應對區域衝突等任務為主，2014年克里米亞半島危機前並未有激烈的對峙局

面。此外，軍事結盟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依賴強權意志，仰賴北約提供安全保證的會員國依然認為美國才是最主要關鍵角色，因此可以發現同為北約的歐洲會員國在對美外交政策選擇上呈現多種樣式：有主張戰略自主訴求的法國與匈牙利、與美國保持等距的土耳其、以及緊緊跟隨美國的波蘭或波海三國等，從國際實踐經驗來看，與強權結盟並非代表避險策略的終點；相對的，加入軍事聯盟後仍有親疏遠近安排，此皆能視為避險策略的運用（Ringsmose and Webber 2020, 295-317; Song 2022, 22-39）。

位處在俄國、歐洲與中東交界處的高加索地區也有著極為豐富的避險策略經驗，由於高加索地區連通歐亞大陸以及裏海與黑海海域，歷史上相當長的時間就是軍事戰略與能源交通要地，不過由於該地區境內山脈眾多，因此民族分布不易集中、不同民族間犬牙交錯的狀況所在多有，區域內各國回應強權競爭時的內部因素更為複雜。例如，長期以來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納-卡（Nagorno-Karabakh）爭議問題，亞塞拜然的策略選擇也採取避險策略。由於亞塞拜然將俄國視為處理納-卡問題的重要行為者，因此即便亞美尼亞加入俄國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亞塞拜然仍對俄國保持友好關係，無論是2008年的俄喬戰爭、2014年的克里米亞半島危機、或是2022年的俄烏戰爭，亞塞拜然對俄國仍然保持相對友好關係（Valiyev and Mamishova 2019, 269-291）。另外，也有相關文獻將避險運用至大國間互動進行分析，檢視大國戰略互動行為與避險策略的相關性，以此檢視大國互動策略的避險行為（蔡明彥、張凱銘 2015；張凱銘 2020, 107-170）。

此外，東亞地區的避險研究也非常顯著。由於近年來受美中競爭加劇的影響，東亞各國被迫回應此種國際權力結構變化，關注中國崛起與美中競爭、又或者是美中會否落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在全球各地眾多的個案研究中，東南亞國協會員國的政策選擇尤其受到矚目，東協強調不干涉內政（principle of non-intervention）與尋求會員國最大共識的運作精神，該核心原則使東協得以運作至今。東協會員國透過細膩的外交藝術（art of diplomacy），在美中競爭格局中充分展現出避險策略的核心要旨所在（Jones and Jenne 2022, 205-235）。將制度本身視為在美中強權競爭過程中的緩衝策略選擇，Mie Oba也抱持此種看法，Oba認為制度避險（institutional hedging）

為東協國家所接受，並且也在此架構下開展東南亞的區域整合與發展區域主義認同，簡言之，諸多個案顯示避險策略在東協的高度運用（Oba 2019, 125-140）。

綜合上述討論，本文的避險策略有以下幾個假定：第一，即便在結盟的情形下，中小型國家仍可採取避險策略回應強權競爭；第二，中小型國家面對強權時的避險作為多以軍事與經濟兩大面向為主軸；第三，中小型國家在不同時期可能呈現出不一樣的親善或敵對政策，因此理解這一群國家政策變化需要區隔不同時期才能得出轉型路徑，以下本文將從複雜式避險策略角度進行分析。

參、複雜式避險策略

順著上述討論，本文聚焦中小型國家面對三個強權時如何採取回應的策略模式，這個部分的研究設計集中在個案面對哪些強權、個案如何在面對三個強權的框架下進行避險、以及避險策略的類型與分析。

（一）歐洲當前主要強權

雖然前述相當多文獻將避險策略進行分類、並且也對中小型國家面臨強權時所可能採行的政策取向進行分類，衆多文獻核心把這一群組國家視為在兩強競爭下的理性行為者，較少探求中小型國家面對三個強權時的整體策略面貌。過往在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或冷戰結束初期的區域安全，權力結構多呈現美蘇兩極對立或美中、美俄的競爭對抗，但隨國際權力結構不斷變化，歐洲與亞洲的連結越來越深、傳統型區域強權外交政策逐漸向區域外擴張，這就讓傳統的區域型強權逐漸蛻變為跨洲性強權，從亞洲向歐亞兩大洲連結發展，並且讓若干歐洲中小型國家在該區域面臨多個主要強權。

對本文研究個案來說，美國是友善強權，屬於歐洲地區最主要的安全保證行為者，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提供的安全保證是這些國家面對冷戰兩極體系瓦解、獲得外部安全保證的主要憑藉所在，這一群國家透過軍事結盟方式取得國防安全的保證，特別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第五條「各締約國同意對於歐洲或北美之一個或數個締約國之武裝攻擊，應視為對締約國全體之攻擊」（The Parties agree that an armed attack against one or more of them in

Europe or North America shall be considered an attack against them all, see Article 5,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1949），該項條文規定讓所有參加北約組織的會員國享有極大程度的安全保障承諾，自從加入北約後，北約會員國未曾直接涉入歐洲地區的戰爭衝突。我們觀察北約組織的創始會員國（亦即1949年的美國、加拿大、比利時、法國、盧森堡、荷蘭、英國、丹麥、挪威、冰島、葡萄牙與義大利）、1952年的希臘與土耳其、1955年的西德、1982年的西班牙、1999年的波蘭、捷克與匈牙利、2002年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與斯洛維尼亞、2009年的阿爾巴尼亞與克羅埃西亞、2017年的蒙特內哥羅、2020年的北馬其頓以及2023年的芬蘭，這些國家都將加入北約作為鞏固國家安全的主要策略之一。

本文擇定的個案研究聚焦在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三個國家，這三國以土耳其加入北約時間最久、立陶宛與匈牙利則都是冷戰結束後才加入的會員國。土耳其加入北約與中東地區的安全局勢很有關聯，冷戰初期中東地區呈現出混雜多元的安全需求，以色列—阿拉伯國家對立為其主因。由於阿拉伯地區各國處於對立狀況，如伊拉克的哈希姆王朝（Hashemite Kingdoms of Iraq）與約旦王國對立、或埃及與沙烏地阿拉伯對立，這些對立因素讓中東地區難以出現一個統一的集體防衛組織，因此美國在設計二次大戰後的歐洲安全戰略時，其首要安排便是將土耳其納入北約以嚇阻冷戰時期蘇聯、並確保地中海與黑海的航行自由（Yeşilbursa 1999, 70-102; Binder 2012, 95-106）。立陶宛與匈牙利加入北約的思維也相同，冷戰結束後北約東擴目的就是提供歐俄間廣大的中間地帶國家安全保證、並避免讓這些國家回到俄國勢力範圍，這些從兩極對立體系瓦解中解放的中東歐國家也多選擇加入北約作為外交政策主要目標。

俄國一直是中東歐國家主要的安全關懷，包含匈牙利與立陶宛在內的前蘇聯時期的衛星國與加盟共和國，在後冷戰時期以擺脫俄國為目標，對這些國家來說，加入北約無疑獲得具拘束力的安全保障承諾；對美國來說，接納這一群組國家加入北約不僅攸關歐洲安全、也與美國國內政治氛圍高度相關。後冷戰時期美國應對歐洲安全與對俄外交政策，其中一項決定性因素就是美國國內政治，北約是否擴張與美國國內政治發展有相當關連，1990年代初期美國甚至有過是否應該將俄國納入北約的討論，以此作為穩固歐洲整體

安全框架，雖然北約最終與俄國相應和，但北大西洋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NACC）的設置是相應的妥協方案。俄國前總統葉爾欽對俄國如何與北約保持良性互動，提出「俄羅斯加入北約的問題，雖然我們準備將其視為一個長期的政治目標。」的相關談話（We are raising the question of Russia's admission to NATO, although we are prepared to regard this as a long-term political goal），這無疑是葉爾欽時期對北約最友好的善意表現之一；時任北約秘書長的Manfred Wörner公開表示「北約大門是敞開的。」（NATO's door is open），這些都說明了冷戰後初期的歐洲安全局勢有可能將俄國納入歐洲地區安全架構（Marten 2017, 135-161）。不過很可惜地，自此之後北約與俄國便再無此良性互動，中東歐國家選擇再次將假想敵重新定位為俄國。

中東歐國家加入北約對俄國而言是其戰略退卻的重大表徵，就當前北約擴張過程來看，俄國已經失去北起芬蘭、波海三國、中歐的維斯格拉瓦集團（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至巴爾幹半島的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等傳統勢力範圍圈，這些國家加入北約即讓俄國失去緩衝區並讓其戰略空間受到嚴重擠壓。2008年的俄國—喬治亞戰爭、2014年的克里米亞半島危機、2022年的俄烏戰爭，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都是俄國試圖扭轉戰略退卻的回應方式（Sushentsov and Wohlforth 2020, 427-450）。

除美國與俄國外，中國是歐洲地區新興的重要行為者，隨著中國崛起過程向歐洲不斷拋射影響力，對歐洲國家來說，中國屬於形象日益明確的境外強權，與中國關係逐漸成為政治與經濟場域的主要議程，而中、俄之間的互動，也使歐洲國家時而將兩者視為同一陣營、但有時又將兩國視為不同類別，這些特徵使得中國成為影響歐洲安全局勢重要的第三方。自習近平2012年任中共總書記、2013年9月於哈薩克、10月於印尼演講時分別推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後，雙邊關係漸趨熱絡。中國視一帶一路為國家重要戰略，該戰略其中一項戰略目標為與歐洲國家的戰略對接，是以經濟為主導的多面向互動關係。中國透過帶路倡議發展其與歐洲國家交往關係，其中一項交往架構以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ECC）機制為主，該機制以16+1、17+1或14+1簡稱之，這是由於近年來參與該區域的會員國數目有所增

減所致。有鑑於中國於中東歐地區的影響力逐步增加，但伴隨而來的挑戰也不斷上升，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下的夥伴國對中國基礎建設投資不足、國家安全疑慮有所抱怨，近期雙邊關係出現許多挑戰（Pavlićević 2018, 688-702; Üncel and Guner 2021, 49-67）。土耳其雖未包含在16+1機制內，不過隨帶路倡議推出，中國與土耳其關係也出現若干變化，土耳其期望將自己打造成橫跨歐洲、亞洲與中東地區的交通與能源樞紐、中國則期望與土耳其合作以擴張帶路倡議在這個區域的影響力，雙方雖有若干歧見，但也隱含許多合作空間（吳雪鳳、曾怡仁 2017, 41-74）。

（二）複雜式避險分析框架

傳統避險策略的核心旨趣在於了解中小型國家如何在兩大強權間進行避險，將避險主軸集中在中小型國家選擇與聯盟強權結盟、但卻與敵對強權開展經濟交流的策略作為，不過此種模型很難處理區域權力結構發生變化之際，因為過往多數相關文獻多僅以這一群國家面對兩強時如何回應作為研究設計，集中討論這一群國家如何在美—俄間高度競爭環境中採取回應。其他文獻則從中國崛起角度討論歐洲國家與中國發展，分析帶路倡議與歐中雙邊的競合關係，相關文獻較少同時處理這一群中小型國家如何在美俄中三方回應的研究設計。本文的研究出發點在於當區域權力結構加入一個新的強權時，傳統避險模型較難詮釋此種變局，為能解開前述困境，本文引入複雜式避險（*versatile hedging strategy*）概念，也就是模擬中小型國家面對的強權數目增加為3個時，以此分析中小型國家可能的避險策略內涵。

1. 複雜式避險基本假定

本文的避險策略分析時間以2012年至2022年的10年期間，觀察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這三國的策略發展。選擇這10年時間進行觀察有以下幾個重要意涵：第一，從時間上看，2012年後是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外交重要年份，中國在歐洲的角色大幅提升，北京的政策引導讓歐洲各國益發重視中國，帶路倡議推出時若干觀察認為中國資金有望為歐洲部分資金短缺的國家提供適時援助，協助該等國家進行提升必要的基礎建設（Gruebler 2021, 77-101; Turcsanyi and Kachlikova 2020, 58-81）；另外也有研究指出這些國家接受中國資金代表可能成為中國的扈從國，從而使該國對外行動受到北京影響，來自中國的影響

力將改變這些國家外交政策走向（Conley et al. 2020, 1-35）。前述討論指出帶路倡議可能對歐洲國家產生影響，立陶宛（波海海域）、匈牙利（中歐）與土耳其（黑海與中東區域）三國都在帶路倡議的必經之路，觀察帶路倡議過往10年發展可窺探這三國對帶路倡議作為的回應方式。

第二，從地緣政治上來看，2013年至2014年是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爆發危機（以下簡稱：危機）的重要年份，危機起因於當年年底烏克蘭內部的一連串爭議事件，時任總統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在歐盟與俄國之間被迫選邊，歐、俄雙方都要求亞努科維奇加入各自陣營、要求烏克蘭倒向歐洲聯盟或俄國。在亞努科維奇選擇中止與歐盟聯繫協定（Association Agreement）簽署後，2013年年底烏克蘭首都基輔出現大規模示威抗議，該股浪潮席捲至烏克蘭全部大城市。2014年年初亞努科維奇雖與反對派達成妥協方案、同意就烏克蘭憲法進行修改限縮總統權力，不過最終亞努科維奇仍在群眾壓力下避走俄國，俄國以佔領克里米亞半島、舉行歸屬公投決定該半島的走向，克里米亞半島危機因此成為影響烏克蘭與歐洲最重要的國際事件。與此同時，圍繞在烏克蘭周邊地區的國家對此紛採各種政策回應，2014年烏克蘭危機一時間成為歐洲安全重要關鍵時刻（Strycharz 2020, 133-144）。本文研究的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三國分別是圍繞在以烏克蘭為核心的波羅地海海域、中東歐與黑海海域國家，這三國所處的地緣位置恰巧形成了以烏克蘭為核心的環形區域。2022年俄烏戰爭（以下簡稱：戰爭）再度形成影響地緣政治重要時刻，使得歐洲多數國家採取更嚴厲地制裁政策，可以說很大程度地改變歐洲國家的親俄／親歐立場，本文關懷的三個個案於戰爭期間也各自展現回應之道。

第三，觀察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三國策略是一個絕佳契機，本文關注三國外交策略的特殊之處是分析三個中小型國家夾在俄、美、中三方競逐的區域權力格局，我們可藉此檢視中小型國家面臨多個強權時的策略選擇變化，了解這一群組國家的策略變化軌跡。

2. 複雜式避險策略分析框架

我們假定中小型國家所處安全環境存在三個強權時，關懷對象分別是與本國關係友善的聯盟強權（A）、與本國關係不友善的敵對強權（B）、以及尚

待釐清關係的新興強權（C）。理解這一群國家對強權的政策偏好從軍事與經濟兩個面向，掌握這一群組國家與強權的友善程度。在軍事面向上，我們以中小型國家有無與強權結盟視為軍事關係的友好或敵對表現；在經濟面向上，我們以中小型國家與強權雙邊貿易評估經濟關係的友好或敵對表現。

表1 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基本框架

	軍事		經濟	
與聯盟強權A	友善	敵對	友善	敵對
與敵對強權B	友善	敵對	友善	敵對
與新興強權C	友善	敵對	友善	敵對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首先從軍事關係來看，中小型國家在面對3個強權時的軍事互動可以有 $(2)^3 = (2) \times (2) \times (2) = 8$ 種可能的類型組合，這8種類型分別是：

與A軍事友善、與B軍事友善、與C軍事友善
 與A軍事友善、與B軍事友善、與C軍事敵對
 與A軍事友善、與B軍事敵對、與C軍事友善
 與A軍事友善、與B軍事敵對、與C軍事敵對
 與A軍事敵對、與B軍事友善、與C軍事友善
 與A軍事敵對、與B軍事友善、與C軍事敵對
 與A軍事敵對、與B軍事敵對、與C軍事友善
 與A軍事敵對、與B軍事敵對、與C軍事敵對

從經濟關係來看，中小型國家在面對3個強權時的經濟互動可以有 $(2)^3 = (2) \times (2) \times (2) = 8$ 種可能的類型組合，這8種類型分別是：

與A經濟友善、與B經濟友善、與C經濟友善
 與A經濟友善、與B經濟友善、與C經濟敵對
 與A經濟友善、與B經濟敵對、與C經濟友善

與A經濟友善、與B經濟敵對、與C經濟敵對
 與A經濟敵對、與B經濟友善、與C經濟友善
 與A經濟敵對、與B經濟友善、與C經濟敵對
 與A經濟敵對、與B經濟敵對、與C經濟友善
 與A經濟敵對、與B經濟敵對、與C經濟敵對

如果我們同時把軍事與經濟相搭配，8種軍事類型都可以與8種經濟類型相互搭配，這時候將有 $(8)^2 = (8) \times (8) = 64$ 種配對組合，這64種配對將能涵蓋所有軍事與經濟層面的可能搭配，不過要窮盡64種策略並一一檢視本文關注的三國個案研究，其複雜程度太高，因此簡化配對組合是需要的。由於本文集中在歐洲中小型國家避險策略探討，個案研究的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三國都已加入北約，在軍事議題上已取得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證，三國皆為美國於歐洲地區的重要盟邦。另外三國與美國的經濟交流也甚為密切，土耳其早於冷戰初期就獲得美國援助以對抗共產主義，美國也是土耳其主要貿易夥伴，而立陶宛與匈牙利則在歐盟架構下開展與美國經貿交流，美國皆是兩國域外的主要貿易夥伴，因此我們可先剔除這三國與美國（聯盟強權）不友善的軍事與經濟敵對選項。另外，由於中國2012年起對歐政策主軸以政經交流為主，軍事議題仍非主軸，因此本文先排除這三國與中國的軍事關係。在除去這三國與美國（聯盟強權）的軍事／經濟關聯、以及除去與中國（新興強權）的軍事關聯後，我們可將配對組合簡化為以下八種類型，本文將從這八種類型分析三國的避險策略演變：

類型一：與A友善、與B（軍事友善、經濟友善）、與C經濟友善
 類型二：與A友善、與B（軍事友善、經濟友善）、與C經濟敵對
 類型三：與A友善、與B（軍事友善、經濟敵對）、與C經濟友善
 類型四：與A友善、與B（軍事友善、經濟敵對）、與C經濟敵對
 類型五：與A友善、與B（軍事敵對、經濟友善）、與C經濟友善
 類型六：與A友善、與B（軍事敵對、經濟友善）、與C經濟敵對
 類型七：與A友善、與B（軍事敵對、經濟敵對）、與C經濟友善

類型八：與A友善、與B（軍事敵對、經濟敵對）、與C經濟敵對

前述八種類型僅代表邏輯上可能、但實務上是否可能出現這些類型，仍需仔細觀察才能得知，下文將就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的避險策略進行分析，以此檢視這三國避險策略的演變路徑。

肆、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複雜式避險策略的個案研究

本文將研究主軸集中在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三國個案研究，這三國位處歐洲東部，素來是歐洲與亞洲大陸的交匯處。立陶宛位於波羅地海海域，是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與歐洲東部和俄國等地的交通要道，長期以來受俄國與西歐國家影響甚鉅。立陶宛人口約280萬，土地面積約6.5萬平方公里，16世紀與波蘭組成波蘭—立陶宛聯邦（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後遭波蘭、俄國、德國等國瓜分，1990年3月再次獨立至今。

匈牙利位於東、西歐交界，官方語言為馬札爾語（Magyar），過往曾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國組成奧匈帝國，為中歐地區重要行為者，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失去眾多領土與人口，蛻變成僅約1,000萬人與9.3萬平方公里的中小型國家。2010年匈牙利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Magyar PolgáriSzövetség，以下簡稱：青民盟）國會勝選成為第一大黨，黨主席奧班（Orbán Viktor）成為總理。

土耳其國名在土耳其語中為Türkiye，意思是突厥人的土地，土國在三國中屬於較大型的中小型國家，人口約8,300萬人、土地面積約78萬平方公里，其地緣位置處於歐亞非三大洲交界，為文明古國，該國與希臘、巴爾幹半島、高加索、中東等國家交壤，在中東地區舉足輕重，扼守黑海與地中海兩大海域，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 Strait）與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Strait）具有相當重要的戰略地位（Anastasakis 2004, 45-60）。從地緣上看，以基輔為中心，這三個國家首都距離基輔都約略在1,000公里上下、三國也剛好位處烏克蘭的北面、西面與南面地理位置，同時也屬於小型、中型與較大型的中小型

國家，這些特徵使得觀察中小型國家安全策略選擇時有相當意涵，下文說明這三國策略選擇發展。

一、立陶宛安全策略選擇（2012年～2022年）

立陶宛自1991年獨立起採雙首長制，由總統與總理共享行政權力，歷任立陶宛總統為Vytautas Landsbergis（1990～1992）、¹Algirdas Mykolas Brazauskas（1993～1998）、Valdas Adamkus（1998～2003）、Rolandas Paksas（2003～2004）、Valdas Adamkus（2004～2006）、Dalia Grybauskaitė（2009～2019）、Gitanas Nausėda（2019-）；立陶宛總理主要以右派的祖國聯盟（Homeland Union）與左派的立陶宛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Lithuania）兩大陣營為主，2020年10月國會大選結果選出由祖國聯盟、自由運動和自由黨三黨聯合內閣，推舉Ingrida Šimonytė出任總理，再加上原本即以強硬對付俄國與白俄羅斯著稱的瑙塞達，當前立陶宛政府採取了很明顯的保守策略，因此回顧立陶宛獨立後的外交政策，主軸就是以不斷融入西方，以及加入聯合國、歐洲聯盟、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與日後的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與區域性國際組織為政策目標。

（一）立陶宛軍事發展

立陶宛自獨立起的安全政策主軸就是以加入北約為主，這裡一個特殊現象是立陶宛首任領導人Landsbergis於1991年5月31日以非官方身分訪問北約總部，出訪的時間點早於國際社會承認立陶宛獨立的時間（1991年8月24日丹麥、冰島與挪威等國為第一波正式承認立陶宛獨立的國家），可見北約與立陶宛很早就開啓了相互接觸的政策作為（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2022）。同年12月20日立陶宛更是加入了北大西洋合作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以下簡稱：NACC），該理事會是北約組織正式與前華沙公約組織會員國進行合作的首個制度，隔天（12月21日）阿拉木圖協議簽署、蘇聯時期正式結束，這些變化說明立陶宛當時

¹ 1992年立陶宛制定憲法前領導人稱為最高委員會主席（Chairman of the Supreme Council），憲法通過後則稱為總統，因此藍博吉斯的正式名稱應為最高委員會主席。

所處國際環境轉型的激烈程度與立陶宛外交政策走向（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2）。

1994年1月4日時任立陶宛總統的Brazauskas正式遞交一份由國會各政黨所署名的申請加入北約信件，表達該國加入北約的正式意向書，並在同年1月27日加入北約的PfP（Partner for Peace）計畫，這個計畫設置的目的是北約在NACC架構下進一步深化與前華沙公約組織個別國家的軍事合作計畫，包含演習、訓練、國防事務改革等各種項目，立陶宛是所有前華沙公約組織會員國中最早加入此一計畫的國家。2002年時任立陶宛的Adamkus總統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受邀開啓加入北約談判，就這些國家未來與北約的快速反應部隊、北約的軍事指揮、軍事能力承諾、打擊恐怖主義、大規模核生化武器防禦、網路攻擊等安全議題進行協商（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4）。經過一系列雙邊談判，立陶宛最終於2004年3月正式成為北約會員國。

加入北約後的立陶宛並未停止與北約的軍事整合，2005年Adamkus第二任期在北約架構下提供伊拉克及阿富汗任務的軍事援助，同時也推動巴爾幹半島國家（塞爾維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蒙地內哥羅等國）加入PfP計畫，並於2008年大力支持克羅埃西亞與阿爾巴尼亞受邀加入北約談判、支持烏克蘭與喬治亞成為北約會員國。

相較於立陶宛不斷向北約靠攏，其對俄國則呈現不斷疏遠的路徑發展。由於歷史上立陶宛多次與俄國發生戰爭，因此對俄國始終抱有很大戒心，1990年至1991年間立陶宛宣布獨立之際，與當時蘇聯曾有短暫的交火，不過衝突旋即停止。自1991年正式獨立起至2022年止，立陶宛僅有Brazauskas於1997年、Adamkus於2001年、2005年訪問過莫斯科，俄國則從未有過總統訪問過立陶宛，可見兩國外交關係並不和睦（Park and Jakstaite-Confortola 2021, 1279-1302）。

2014年克里米亞半島危機發生之際立陶宛順勢推動軍事改革，其中一項是恢復徵兵制以爲可能的戰爭進行準備。時任總統的Grybauskaitė 2015年爭取北約於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設置北約武力整合單位（NATO Force Integration Unit, NFIU），該組織主要任務是針對北約東部可能威脅採取相對應的軍事措

施（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2022）。2017年北約強化前進佈署（Enhanced Forward Presence, EFP）實現了立陶宛多年以來的國防目標，也就是將北約軍隊佈署在立陶宛國境內，北約的強化前進佈署主要以波海三國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再加上波蘭這四國為主，波蘭為接收北約部隊數量最多國家，約達11,600人，立陶宛雖僅接收約3,700名部隊，卻已經佔該國2萬名常備部隊的18.5%，比例為四國之最，可說立陶宛藉克里米亞半島危機強化其對俄的軍事對抗策略。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之際，立陶宛總統Nausėda立刻譴責俄國對烏克蘭的侵略，並立刻與波蘭總統、烏克蘭總統召開三邊會議，充分表達立陶宛對烏克蘭的支持。在軍事層面上，立陶宛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援似無止境，根據統計，開戰後至2023年6月立陶宛已提供近10億歐元的軍事、金融、人道主義和重建支援，以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比計算，立陶宛超越美國與歐洲各國，是對烏克蘭第一大捐助國（Goncharova 2023）。除此之外，立陶宛還立刻禁止轉播俄國RTR Planeta、Rossiya 24、NTV Mir等各頻道的電視節目，並在布查（Bucha）事件後驅逐俄國駐立陶宛大使、關閉俄國駐立陶宛最大海港Klaipėda領事館；由於立陶宛與俄國飛地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相連，因此立陶宛也禁止了俄國由加里寧格勒經立陶宛的過境貨物運輸，涵蓋範圍從鐵路到公路通通適用。俄國對立陶宛的禁令甚為光火，認為這阻礙了加里寧格勒的生存權，不過立陶宛認為這是其為執行歐盟禁令而採取之必要作為，歐盟隨後介入立陶宛與俄國爭議，決定放寬加里寧格勒貨運可藉由鐵路運輸（Strozewski 2022）。

（二）立陶宛與俄、中經貿發展

立陶宛以歐洲國家為主要貿易對象，包括拉脫維亞、波蘭、德國、俄國、愛沙尼亞與荷蘭等國，主要出口項目為礦藏、家具、塑膠製品、電器產品、藥品等製造工業；進口產品則以機械產品、汽車、發電設備等項目為主，以下分別就立陶宛對俄及對中的進出口貿易與外商直接投資進行分析。

1. 立—俄貿易與投資

就立陶宛與俄國的進出口貿易來說，雙邊貿易關係主要以工具機、鍋爐、各式酒類製品、塑膠、鋼鐵製材、木製品等品項為主，以進出口總值來說，雙邊經貿最熱絡時期為2012～2013年的高峰期，2014年後逐步下滑，下降趨勢

一直持續到2016年，2022年更是大幅劇減。立陶宛與俄國進出口貿易一項重要產品是天然氣，2012年立陶宛全年天然氣所需幾乎皆由俄國進口，然2014年克里米亞半島危機爆發時立陶宛自俄國進口天然氣開始陡降、當年度僅進口約立陶宛全年度所需的40%，此種嘗試降低天然氣依賴的努力到了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立陶宛主動宣布自2022年4月1日起全面停止進口俄國天然氣（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Reuters 2022）。從俄國對立陶宛直接投資金額來看，可發現俄國資金逐步自立陶宛撤出，2014年克里米亞半島危機發生時資金撤離情況尤為明顯，俄烏戰爭開戰前也可見俄國資金再度撤出立陶宛，2022年更未見俄國對立陶宛有任何投資行為，顯見俄國在經濟層面上已將立陶宛視為不友善國家，進出口總額與俄國對立陶宛投資請參閱下表。

表2 2012年～2022年立陶宛對俄羅斯進出口貿易總額

	Export (thousands of USD)	Import (thousands of USD)
2012	5,598,041	10,401,418
2013	6,467,137	9,784,162
2014	6,755,115	7,620,568
2015	3,479,312	4,596,899
2016	3,371,118	3,793,242
2017	4,449,006	4,059,444
2018	4,665,591	5,172,731
2019	4,632,258	5,189,608
2020	4,386,411	2,935,961
2021	4,415,952	5,308,502
2022	2,880,000	2,840,000

資料來源：2012年至2021年立陶宛對俄國的進出口資料引自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LTU>; 2022年資料引自Trading Economics, Lithuania Imports/Exports to Russia。

表3 2012年～2022年俄羅斯對立陶宛投資

年度	當年度投資金額（百萬美元）
2012	-109.52
2013	71.57
2014	-722.94
2015	-11.84
2016	6.47
2017	12.75
2018	7.91
2019	21.26
2020	-66.51
2021	-23.40
2022	n/a ²

資料來源：Bank of Russia, Dashboards.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s by Geographical Region, Partner Country, Instrument and Industry.” or see https://www.cbr.ru/eng/statistics/macro_itm/svs/npi/。

2. 立—中貿易與投資

從雙邊制度性交流機制來看，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制度化交流始於2012年4月成立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簡稱16+1，這是一個由中國與中東歐地區的波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維斯格拉瓦集團（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巴爾幹半島地區（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塞爾維亞、蒙地內哥羅、北馬其頓、阿爾巴尼亞）衆多國家組合的區域合作機制，2019年希臘加入、2021年3月立陶宛退出、2022年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也隨之退出，目前爲14+1。

立陶宛對中國的經貿交流主要以電器設備、機械製造、鐵軌運輸載具、塑膠製品等幾項貨物貿易爲大宗，其中幾項不乏爲中間貨品、也就是立陶宛自

² Bank of Russia未提供2022年全年統計數據。

中國進口後再出口至其他各地。從雙邊貿易額可以看出，立陶宛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量自2012年起逐年增長，2021年為雙邊最高峰，2022年立陶宛對中出口呈現斷崖式下滑，顯示立陶宛對中國採脫鉤式經濟政策（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2023, 6）。另外，從中國對立陶宛的直接投資統計來看，2012年與2013年為高峰期，不過2014年、2015年、2017年、2019年未見投資行為，2018年甚且出現撤資現象，請參閱下表。

表4 2012年～2022年立陶宛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

	Export (thousands of USD)	Import (thousands of USD)
2012	85,932	681,588
2013	117,270	750,783
2014	135,361	884,211
2015	113,355	806,015
2016	136,305	784,256
2017	202,222	929,395
2018	222,728	1,009,313
2019	309,139	1,039,963
2020	357,755	1,336,895
2021	207,297	1,855,223
2022	103,000	2,090,000

資料來源：2012年至2021年立陶宛對中國的進出口資料擷取自<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LTU>；2022年資料擷取自Trading Economics, Lithuania Imports/Exports to China, or see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lithuania/imports/china>。

表5 2012年～2022年中國對立陶宛投資

年度	各年度投資金額（萬美元）
2012	100
2013	551

年度	各年度投資金額（萬美元）
2014	n/a
2015	n/a
2016	225
2017	n/a
2018	-447
2019	n/a
2020	33
2021	20
2022	0

資料來源：〈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http://images.mofcom.gov.cn/hzs/202111/20211112140104651.pdf>；〈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22），<http://images.mofcom.gov.cn/fec/202211/20221118091910924.pdf>，中國對立陶宛2022年投資資料來源參閱周海媚，《2022年中國海外投資概覽》，安永中國海外投資業務部，2023年2月16日。

將立陶宛對俄國的軍事政策、經濟政策與對中國的經濟政策立場加以統整，我們將會得到表六與表七的兩個初步結論：

表6 立陶宛對俄軍事與經濟立場統整

	克里米亞半島危機	俄烏戰爭
立陶宛對俄政策立場	危機爆發後與北約強化前進佈署、接受北約駐軍；開始降低對俄經濟與天然氣依賴。	開戰前提供刺針飛彈，開戰後持續提供重型武器；2022年4月1日起主動停止進口俄國天然氣。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7 立陶宛對中經濟政策立場統整

	帶路倡議初始	帶路倡議十周年
立陶宛對中立場	帶路倡議推出後立陶宛即為16+1成員，雙邊經貿關係微幅升溫，但中方對立投資金額未見明顯增加。	過去10年立一中雙邊經貿關係無甚發展，立陶宛對中國出口頻降但進口數量仍持續增加。2019年立陶宛決定退出16+1機制、2022年後無中國對立陶宛新增投資案件。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匈牙利安全策略選擇（2012年～2022年）

匈牙利位處歐洲中心地帶，北與斯洛伐克、西與奧地利和斯洛維尼亞、南與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東與羅馬尼亞和烏克蘭等國交界，與多國交界的特色使得匈牙利歷史上與鄰近國家之間累積許多的恩怨情仇。另匈牙利主要貿易對象為德國、義大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奧地利等國，中國近幾年來躍升為主要出口國，出口產品以原物料與中間財為主。

（一）匈牙利軍事發展

1989年10月匈牙利開始進行非共化與民主化運動，這個過程與波蘭透過圓桌談判與當時的共黨政府取得共識的模式類似，當時匈牙利共產黨——社會主義工人黨（Hungary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在民意的壓力下很快與反對派進行談判、就國會舉行改選一事進行協商，而後隨即於1990年3月25日舉行匈牙利的第一次民主化國會選舉，匈牙利民主論壇（Hungarian Democratic Forum）擊敗社會主義工人黨並成為國會第一大黨，由József Antall出任首位民選總理。

如果我們觀察冷戰結束後的匈牙利歷任總理（剔除代理或任期未滿一年的總理），這些總理分別是：中間偏右的民主論壇的József Antall（1990～1993）、中間偏左的社會黨Gyula Horn（1994～1998）、右派的青年民主聯盟的Viktor Orbán（1998～2002）、與左派社會黨友好的Péter Medgyessy（2002～2004）、因Medgyessy失去支持而繼任的Ferenc Gyurcsány（2004～

2009）、社會黨短暫過渡型的政治人物Gordon Bajnai（2009～2010）、以及再度上台的右派青年民主聯盟Viktor Orbán（2010～至今）。從過往匈牙利的執政經驗可以看出，2010年前的匈牙利呈現穩定的左右擺盪局面，左右政黨輪流執政的態勢相對明顯，不過2010年Viktor Orbán再次上台執政後，開啓右派政黨長期執政期。

2014年克里米亞半島危機發生時，匈牙利總理Viktor Orbán對俄國與烏克蘭的態度是很微妙的。居住在烏克蘭境內的匈牙利人約15萬人左右，匈牙利長期對匈牙利人在烏權力多有批評，認為基輔刻意忽略匈牙利人的語言與文化權益，呼籲基輔應該給予這群匈牙利人雙重公民（烏克蘭國籍與匈牙利國籍）身分。Orbán將對俄政策與對歐政策並置、將疑歐主義（Euroscepticism）作為抨擊布魯塞爾政策主軸，控訴歐盟對匈牙利各種不公平作為，將歐盟比擬為前蘇聯對待匈牙利般的強權（Wachs and Herman 2014）。匈牙利對俄國軍事態度相對溫和的另一個體現在於，匈牙利雖也接受北約強化前進佈署計畫，讓北約會員國軍隊佈署在境內，不過和立陶宛不同之處在於這批部隊的防務計畫由匈牙利本國主導（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3）。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之際，匈牙利對烏克蘭的態度是很微妙的，2月28日政府宣布不允許致命性武器跨越匈牙利國土、也不提供軍事援助給烏克蘭，這個立場與鄰近的波蘭（2月1日開戰前提供Fly Eye無人機與各式彈藥，開戰後數日更迅速提供240輛T-72坦克與其他重型武器）、愛沙尼亞（開戰前提供標槍飛彈，開戰後提供榴彈砲與反坦克飛彈等各式重型武器）等國有很大差異，不僅匈牙利本國對烏克蘭援助政策有所不同，匈牙利對歐盟援助烏克蘭也有不同意見：當俄烏戰爭正如火如荼開戰之際，歐盟提出一筆180億歐元的援烏方案遭到匈牙利否決，儘管布達佩斯否決該筆援助的主要目標是為解除匈牙利遭歐盟制裁而凍結的基金分配，不過此舉的附加效用也的確延遲了歐盟對烏援助的時程（Tidey 2022）。

（二）匈牙利與俄、中經濟發展

1. 匈—俄貿易與投資

匈牙利對俄國出口項目以藥品、機械、電器設備、穀物等為主要，自俄國進口項目以能源、燃料等各式發電裝置為主，其餘如橡膠、化學藥品也都是

主要進口項目，能源進口更是匈牙利大宗，根據歐盟資料顯示，匈牙利2012年自俄國天然氣進口仍佔其總消耗量的98%，約為307,515太拉焦耳總發熱值（Terajoule, gross calorific value），2022年仍有95%所需自俄國進口，由於匈牙利有龐大需求，俄國同意未來繼續向匈牙利增加天然氣出口（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Reuters 2023）。

另外，2014年克島危機爆發後4月正值匈牙利國會大選、也就是Orbán競選連任的時刻，Orbán勝選後匈牙利外交政策加大開放東方政策（Eastern Opening Policy）為主軸並強化對俄交往政策（Végh 2015）。俄國Rosatom公司協助匈牙利於帕克斯（Paks）建造核電廠、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與匈牙利建造南溪（South Stream）匈牙利段（Andrzej Sadecki 2014）等都是兩國能源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因此克里米亞半島發生危機之際Orbán以「匈牙利不是該場衝突的一部分」（Hungary is not part of the conflict）表達對該危機的立場避免譴責俄國，對烏克蘭領土完整的訴求也輕輕帶過。關於雙邊進出口貿易與俄國對匈牙利投資，請參閱下表。

表8 2012年～2022年匈牙利對俄羅斯進出口貿易總額

	Export (thousands of USD)	Import (thousands of USD)
2012	3,286,884	8,283,260
2013	3,373,891	8,540,719
2014	2,885,657	7,292,483
2015	1,796,783	4,776,876
2016	2,244,571	4,886,965
2017	1,919,343	3,574,317
2018	1,840,033	4,604,945
2019	2,026,859	4,471,450
2020	1,881,814	2,589,051
2021	2,067,579	4,269,442
2022	1,380,000	9,640,000

資料來源：2012年至2021年資料引自<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HUN/Year/2012/TradeFlow/EXPIMP/Partner/RUS/Product/all-groups>; 2022年資料引自Hungary Exports to Russia/Imports from Russia, or see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hungary/imports/russia>。

表9 2012年～2022年俄羅斯對匈牙利投資

	各年度投資金額（百萬美元）
2012	-120.69
2013	129.41
2014	43.57
2015	-50.55
2016	34.75
2017	10.93
2018	20.44
2019	-15.22
2020	-2.06
2021	4.39
2022	n/a ³

資料來源：Bank of Russia, Dashboards.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s by Geographical Region, Partner Country, Instrument and Industry.” https://www.cbr.ru/eng/statistics/macro_itm/svs/npi/。

2. 匈—中貿易與投資

匈牙利與立陶宛都是16+1機制的創始會員國，中國很早即將匈牙利視為中東歐地區重要的合作夥伴，雙邊經濟交流熱絡。匈牙利也是最先與中國簽署帶路倡議合作備忘錄的歐洲國家，並且相當著力於拓展雙邊經貿關係。觀察雙邊貿易，匈牙利對中國出口項目主要以電器設備、車輛製造業、機械產品、光學產品等項目為主，自中國進口項目以電器產品、光學產品、機械、家具等為主，雙方在製造業項目上有較強的互補性，2014年達匈牙利與中國雙邊貿易階段性高峰，2020年雙邊貿易總額更一舉突破百億美元。雙邊熱絡的經貿交流也同樣表現在中國對匈牙利的投資行為上，匈牙利計畫建設連接其與塞爾維亞兩國首都的鐵路，並將匈牙利段（約152公里長）交給由匈牙利國家鐵路

³ Bank of Russia未提供2022年全年統計數據。

（Hungarian State Railways）、中國鐵路國際公司和中國鐵路國際集團組成的匈一中合資企業建造，顯示中國對匈牙利投資的重視，從對匈牙利投資比重來看，中國對匈牙利投資比重超越其他中東歐國家，是一個相當受到矚目的發展。另外，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Orbán本人爲了展現對中國製疫苗的信心，親自接種中國醫藥集團開發的疫苗（Xinhua 2021）。

表10 2012年～2022年匈牙利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

	Export (thousands of USD)	Import (thousands of USD)
2012	1,810,642	5,412,282
2013	1,997,306	5,360,437
2014	2,156,226	5,140,096
2015	1,707,361	3,642,933
2016	1,595,367	2,636,732
2017	2,663,851	5,291,354
2018	2,371,480	6,377,348
2019	1,666,499	7,157,897
2020	2,062,772	9,017,060
2021	2,475,922	9,825,403
2022	2,290,000	10,730,000

資料來源：2012年至2021年資料引自<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HUN/Year/2012/TradeFlow/EXPIMP/Partner/CHN/Product/all-groups>; 2022資料引自Hungary Exports to China/Imports from China, or see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hungary/imports/china>。

表11 2012年～2022年中國對匈牙利投資

	各年度投資金額（萬美元）
2012	4,140
2013	2,567
2014	3,402

	各年度投資金額（萬美元）
2015	2,320
2016	5,746
2017	6,559
2018	9,495
2019	12,315
2020	-415
2021	5,353
2022	n/a

資料來源：〈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http://images.mofcom.gov.cn/hzs/202111/20211112140104651.pdf>；〈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22），<http://images.mofcom.gov.cn/fec/202211/20221118091910924.pdf>。

將匈牙利對俄國的軍事政策、經濟政策與對中國的經濟政策立場加以統整，我們將會得到表十二與表十三的兩個初步結論：

表12 匈牙利對俄政策立場統整

	克里米亞半島危機	俄烏戰爭
匈牙利對俄立場	推動強化對俄交往的東邊政策、委由俄國協助匈牙利建造核電廠、宣布與俄羅斯提前建造南溪天然氣匈牙利段、將對俄政策與疑歐主義並置、控訴歐盟對匈牙利各種不公平作為。	不允許致命性武器跨越匈牙利國土、也不提供軍事援助；戰爭爆發後匈牙利持續進口俄國天然氣。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13 匈牙利對中政策立場統整

	帶路倡議初始	帶路倡議十周年
匈牙利對中政策立場	自2012年起匈牙利即是16+1機制會員國，匈牙利與中國保持溫和的雙邊經貿交流、每年中國對匈牙利投資金額也逐漸上升。	帶路倡議於中東歐地區推行10年，匈牙利一舉成為中東歐地區最受矚目的夥伴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三、土耳其安全策略選擇（2012年～2022年）

土耳其位於大陸交匯處的地緣政治特色使其扮演歐、亞兩大洲的橋樑角色，而與巴爾幹和中東等陸地相鄰、連接地中海與黑海的交通要道亦讓土耳其具有關鍵的戰略地位，不僅如此，土耳其還具備北約會員國身分和能源供應轉運的樞紐，這使得土耳其的安全策略選擇具有高度重要意涵。土耳其2014年之前總統為議會選出的虛位元首，2007年修正憲法將總統改為全民直選；2017年再推動憲政改革由內閣制改為總統制，這使得原先已擔任總理多年的Recep Erdoğan（2003～2007、2007～2011、2011～2014）於2014年順利轉換跑道當選握有實權的總統，並在2018年與2023年繼續連任。

（一）土耳其軍事發展

由於土耳其掌控黑海與地中海交通要道，克里米亞半島又是俄國黑海艦隊總部，因此土、俄雙邊軍事關係特別受到矚目。2014年克里米亞半島危機時，對土耳其影響最直接的是居住於當地的土耳其居民，以族裔人口分布來說，除俄羅斯人、烏克蘭人與韃靼人外，最多的外族人口便是土耳其人，因此危機爆發之初土耳其的主要訴求便是區域穩定。除保護族群訴求外，土耳其一方面雖主張維護烏克蘭主權與領土完整，但對俄國舉動的譴責相當低調，採取卸責（buck-passing）策略，視西方國家對俄國的態度來決定土耳其相關作為（Devlen 2014），其結果就是在危機爆發過程中採取模糊立場。土耳其無意讓克里米亞半島危機升溫成重大的區域衝突事件，這主要是危機升溫可能導致土耳其被迫捲入一場對土國不利的衝突環境中，並因此增強俄國干預黑海海

域的動機。儘管土耳其與俄國在高加索地區（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的Nagorno-Karabakh地區衝突）、中東的敘利亞內戰、土耳其飛彈防禦體系等議題上針鋒相對，但土耳其並無意於克里米亞半島危機上提高兩國政治爭端（Ananicz 2014）。

另一個影響土、俄關係的主要事件來自於2015年的敘利亞內戰，由於俄（支持敘利亞總統阿塞德）、土（支持反政府軍）在內戰中分別站在對立面，11月24日又發生了土耳其F-16戰機擊落俄國Su-24戰機的緊急事件，此舉影響雙邊關係甚鉅，俄國對土耳其實施一系列制裁行為，包括取消土耳其旅行免簽、限制土國產品出口至俄國等作為，不過由於2016年土耳其內部出現未成功政變、連帶調整土國對俄政策，雙邊逐漸從2016年下半年恢復穩定關係。

土耳其於2022年俄烏戰爭時採取的避險策略更為明顯，雖然俄烏戰爭動員戰鬥部隊的規模與人員死傷人數遠超2014年的克里米亞半島危機與東巴斯地區戰爭，土耳其對俄、烏雙方的平衡策略也益發微妙。土耳其雖發表譴責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外交聲明，也向烏克蘭提供外交與物資援助，不過土耳其總統Erdoğan明確表示不加入西方國家主導的對俄制裁方案、也不與莫斯科斷絕外交關係（Wilks 2022）。土耳其扼守黑海與地中海交通要道的戰略地位適時地為土耳其的避險策略提供絕佳的支撐來源，烏克蘭（需要黑海通道暢通確保穀物運送順暢）、俄國（需要確保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達達尼爾海峽運行暢通）與北約各盟邦（需要土耳其繼續作為前進中東地區重要基地）都需要與土耳其保持友好關係，這就讓土耳其的平衡策略得以持續展現（Gaber 2023）。除此之外，土耳其的避險策略還增添了議價成分在內，土耳其透過瑞典與芬蘭申請加入北約、尋求外部軍事安全保證之際，取得了與瑞典和芬蘭兩國議價推行反恐、削弱庫德族人尋求獨立的談判空間，這讓土耳其得以使其軍事作為持續保持模糊空間、避免選邊站的壓力。

（二）土耳其與俄、中經濟發展

1. 土－俄貿易與投資

從整體經貿關係來看，進出口貿易是推升土、俄兩國關係的主要助力，俄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土耳其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自2012年起兩國貿易額保持相當友好關係，土耳其對俄國出口約67億美元，進口高達266億美元；土耳

其也承包了俄國近2,000個項目、總價值超過757億美元的各式計畫，顯見兩國經貿關係密切。在這些經貿關係中，能源是土、俄兩國經濟關係最重要的因素，土耳其天然氣管線（Turk Stream Natural Gas Pipeline）已於2020年1月8日開通，該條管線得以讓俄國天然氣輸往土耳其、並轉往巴爾幹半島的保加利亞，可說該條天然氣管線是俄國對歐洲南部國家能源外交的重要基礎（Kutlu 2020）；除天然氣外，俄國也協助土耳其興建阿庫尤核電廠（Akkuyu Nuclear Power Plant），雙邊能源領域合作相當深入。除此之外，旅遊領域也是雙邊經貿關係另一面向，2019年俄羅斯赴土耳其旅遊的遊客超過700萬人次，為新冠疫情前土耳其最大的觀光來源國之一（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9）。

不過俄土雙方關係亦有低潮期，2015年敘利亞戰爭使土、俄關係明顯惡化，由於雙方採取相互經濟制裁的結果，土、俄雙方2015年、2016年貿易連帶受到波及，土耳其該兩年度出口至俄國金額銳減，2016年幾乎僅約2015年出口總額的50%；相對地，土耳其自俄進口也同受打擊，2015年與2016年的進口額也大幅下滑，此種現象一直到2017年才開始回升。從投資面向來看，俄國對土耳其的投資相對不穩定，2013、2015、2018、2019各年度都出現了撤資的行為，顯見俄國對土耳其的投資環境並未具備高度信心。

表14 2012年～2022年土耳其對俄羅斯進出口貿易總額

	Export (thousands of USD)	Import (thousands of USD)
2012	6,680,777	26,625,286
2013	7,213,894	26,046,540
2014	6,170,452	25,411,700
2015	3,684,262	20,744,049
2016	1,792,916	15,467,236
2017	2,869,847	20,097,026
2018	3,652,603	22,710,751
2019	4,152,137	23,115,236
2020	4,506,813	17,829,236

	Export (thousands of USD)	Import (thousands of USD)
2021	5,774,391	28,959,361
2022	9,340,000	58,850,000

資料來源：2012年至2021年資料引自<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TUR/Year/2012/TradeFlow/EXPIMP/Partner/RUS/Product/all-groups>; 2022年資料引自Trading Economics, Turkey Exports to Russia/Imports from Russia, or see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urkey/imports/russia>。

表15 2012年～2022年俄羅斯對土耳其投資

	各年度投資金額（百萬美元）
2012	2094.8
2013	-383.2
2014	1933.77
2015	-76.89
2016	1767.69
2017	588.29
2018	-1258.41
2019	-2204.24
2020	443.91
2021	152.77
2022	n/a ⁴

資料來源：Bank of Russia, Dashboards.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s by Geographical Region, Partner Country, Instrument and Industry.” https://www.cbr.ru/eng/statistics/macro_itm/svs/npi/。

2. 土一中貿易與投資

土耳其與中國雙邊貿易長期保持相對平穩狀態，土耳其於2015年與中國簽署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成為中國在中東地區重要的

⁴ Bank of Russia未提供2022年全年統計數據。

合作夥伴；另一方面，土耳其也將原先規劃的中間走廊倡議（Middle Corridor Initiative）、也就是企圖打造連結歐洲、亞洲與中東的規劃，與帶路倡議相連結，雙方對交通、電信與能源等面向上有較高的合作興趣，2018年土耳其與中國交通部針對土耳其境內的高速鐵路建設提出初步規劃、土耳其也加入亞洲投資銀行成為創始會員國，顯見土耳其對參加中國帶路倡議展現了相當的興致（Güneylioğlu 2022）。

不過土耳其與中國雙邊貿易卻呈現相對特殊的現象，土耳其出口至中國總額相對稀少，以2012年為例，當年度土耳其出口至中國總額僅28.3億美元，約為自中國進口總額212億的13%左右，呈現嚴重的貿易逆差，出口項目主要以礦渣、鹽、硫磺、石膏、水泥、貴金屬化合物、機械產品等項目為主；自中國進口主要以機械、鍋爐、電器設備、鋼、有機化學品、塑膠等。近年來雙邊貿易逆差更大，中國對土耳其出口主要以廣播設備、電腦及非零售化纖長絲等項目，土耳其對中國的出口以大理石為主，其次是貴金屬礦石和精煉銅等礦藏品，土耳其出口值僅約同年度進口值7.9%，可見雙方貿易產品項目差異與不均衡關係甚為明顯（Interesse 2022）。另外，中國對土耳其的投資未呈現穩定增長狀態，截至2023年，中國對土耳其投資累計總額為51.1億美元（Demir 2023），雙邊投資項目也以能源項目投資為主。

表16 2012年～2022年土耳其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

	Export (thousands of USD)	Import (thousands of USD)
2012	2,833,255	21,295,241
2013	3,755,649	25,260,751
2014	2,970,633	25,732,865
2015	2,500,618	25,283,734
2016	2,378,537	24,852,474
2017	3,037,675	23,753,643
2018	3,078,644	21,506,001
2019	2,726,077	19,128,159
2020	2,866,389	23,040,812

	Export (thousands of USD)	Import (thousands of USD)
2021	3,662,747	32,238,051
2022	3,280,000	41,350,000

資料來源：2012年至2021年資料引自<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TUR/Year/2012/TradeFlow/EXPIMP/Partner/CHN/Product/all-groups>; 2022年資料引自Trading Economics, Turkey Exports to China/Imports from China, or see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turkey/imports/china>。

表17 2012年～2022年中國對土耳其投資

	各年度投資金額（萬美元）
2012	10,895
2013	17,855
2014	10,497
2015	62,831
2016	-9,612
2017	19,091
2018	35,282
2019	2,883
2020	39,126
2021	22,544
2022	75,000 ⁵

資料來源：〈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21），<http://images.mofcom.gov.cn/hzs/202111/20211112140104651.pdf>；〈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22），<http://images.mofcom.gov.cn/fec/202211/20221118091910924.pdf>；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22年中國—土耳其經貿合作簡況，2023年12月28日。

⁵ 截至本文寫作日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仍未公布詳細數據，因此改採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亞洲司統計訊息。

將土耳其對俄國的軍事政策、經濟政策與對中國的經濟政策立場加以統整，我們將會得到表十八與表十九的兩個初步結論：

表18 土耳其對俄政策立場統整

	克里米亞半島危機	俄烏戰爭
土耳其對俄立場	於半島危機事件上避免譴責俄國行爲、惟雙方關係受到2015年敘利亞擊落俄國軍機影響而陷入低潮，後於2016年至2017年恢復正常。	發表譴責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外交聲明，也向烏克蘭提供外交與物資援助，不過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明確表示不加入西方國家主導的對俄制裁方案、也不與莫斯科斷絕外交關係。2022年土、俄經濟關係不降反增，顯見雙邊有意擴大經濟交流。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19 土耳其對中政策立場統整

	帶路倡議初始	帶路倡議十周年
土耳其對中立場	帶路倡議前雙邊已於2010年簽署戰略合作協定、2015年再簽署帶路倡議諒解備忘錄。	中、土雙邊貿易近幾年大約在280億美元左右，土耳其貿易逆差大，另截至2021年，中國在土耳其已有1,060家註冊企業，並協助土耳其南部建造地熱發電廠。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二）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的複雜式避險策略

前文分析立陶宛、匈牙利、土耳其的對外策略選擇，現在我們再回顧一下本文所提複雜式避險策略的八種類型：

類型一：與A友善、與B（軍事友善、經濟友善）、與C經濟友善

類型二：與A友善、與B（軍事友善、經濟友善）、與C經濟敵對

類型三：與A友善、與B（軍事友善、經濟敵對）、與C經濟友善

類型四：與A友善、與B（軍事友善、經濟敵對）、與C經濟敵對

類型五：與A友善、與B（軍事敵對、經濟友善）、與C經濟友善

類型六：與A友善、與B（軍事敵對、經濟友善）、與C經濟敵對

類型七：與A友善、與B（軍事敵對、經濟敵對）、與C經濟友善

類型八：與A友善、與B（軍事敵對、經濟敵對）、與C經濟敵對

我們將這八種類型再化約成：

類型一：與所有強權友好策略

類型二：強調睦鄰但對較遠方行為者保持戒心的近交遠攻策略

類型三：降低依賴敵對強權的經濟避險策略

類型四：經濟選邊站的避險策略

類型五：全方位擴大經濟交往的避險策略

類型六：目標不清的避險策略

類型七：與聯盟強權和新興強權友好、但聚焦抵抗敵對強權策略

類型八：抗衡策略

我們觀察2012年時，歐洲國家正努力從歐債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中國也正準備將帶路倡議推出的時間點，歐洲大陸也還未爆發克里米亞半島危機，因此帶路倡議推出之時，立陶宛、匈牙利都很快地參與了16+1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成為該機制的創始會員國；土耳其也與中國簽訂諒解備忘錄並開始推動將中間走廊倡議與帶路倡議相互連接，擴大鐵路與能源等面向進行合作。因此我們觀察2012年開始的立、匈、土三國策略，都屬於與美、俄、中三方保持友善的關係鏈，所以採取的是與各方交好的極致避險策略。

立陶宛：類型一與所有強權友好策略

匈牙利：類型一與所有強權友好策略

土耳其：類型一與所有強權友好策略

2014年出現影響區域安全關鍵時刻的克里米亞半島危機，該危機開始衝擊

三國安全策略發展，危機首先衝擊立陶宛，立陶宛很快地調整了對俄策略，由原先的軍事緩和調整為強化戰備、與北約更緊密聯繫與推動北約駐軍，不過此時的立陶宛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仍未受到影響，立一中關係仍屬加溫期，立陶宛策略選擇屬類型七，也就是與美國友善、與中國經濟友善，但聚焦對抗俄國。

危機對匈牙利策略影響較小，匈牙利避免譴責俄國，雖接納北約駐軍但堅持由匈牙利擔任境內北約部隊的協調角色、降低北約與俄國的衝突感，同一時期匈牙利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正值升溫期，雙邊貿易與投資金額逐漸增加，匈牙利成為中東歐地區與中國經貿合作的重要跳板，因此匈牙利這個階段策略調整為類型五，也就是與美國友善、與中國經濟友善，但與俄國溫和平軍事敵對並保持經濟友善關係。

由於土耳其與烏克蘭僅一海之隔，因此危機對土耳其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不過危機初期土耳其還能保持與俄國相對友好關係，但2015年的敘利亞軍機擊落事件使得土、俄關係急速惡化，連帶影響雙邊經貿交流。土耳其與中國的經貿關係未有明顯變化，雙邊正在相關基礎上磋商各式合作案，土耳其該階段策略屬類型七，也就是與美國友善、與俄國軍事敵對且經濟敵對、且與中國經濟友善的型態。

立陶宛：類型七聚焦抵抗俄國策略

匈牙利：類型五全方位擴大經濟交往策略

土耳其：類型七聚焦抵抗俄國策略

相較於2014年克里米亞半島危機，2022年俄烏戰爭地緣政治衝擊波對周邊國家影響更明確，這三國策略選擇展現出另外面貌。立陶宛於戰爭爆發前提供刺針飛彈，開戰後持續提供各式重型武器給烏克蘭，並於2022年4月1日起主動停止進口俄國天然氣，立陶宛對俄國的策略已轉為軍事與經濟層面的抵抗作為；立陶宛2019年也退出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中國也對立陶宛實施經濟制裁，雙邊關係可謂進入冰凍期，因此立陶宛這個階段的策略轉向類型八，也就是與美國友善、與俄國軍事敵對且經濟敵對、與中國經濟敵對的純然抗衡策略。

匈牙利面對戰爭時的態度保持與俄、烏等距作為，雖與歐盟同步制裁俄國，但不允許致命性武器跨越匈牙利國土、也不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同時持續自俄國進口天然氣。另外，歷經10年帶路倡議經營，匈牙利一舉成為中國在中東歐地區最受矚目的夥伴國，雙邊關係快速升溫，因此匈牙利這個階段的策略仍維繫在類型五，也就是仍與美國友善、仍與中國經濟友善，仍採溫和軍事敵對方式面對俄國且保持經濟友善關係。

土耳其2017年與俄國恢復正常關係後，2022年的俄烏戰爭是另一個檢視土、俄關係的試金石，這個時期的土耳其譴責俄國入侵烏克蘭、也向烏克蘭提供外交與物資援助，但不加入西方國家主導的對俄制裁方案，顯示土耳其採取的是溫和的對抗作為，土、俄經濟關係不降反增的現象也顯示土耳其有意繼續在歐、俄間保持明確的等距關係。同一時期的土、中雙邊關係經貿發展也呈現出緩步升溫趨勢，回到與各強權友好的避險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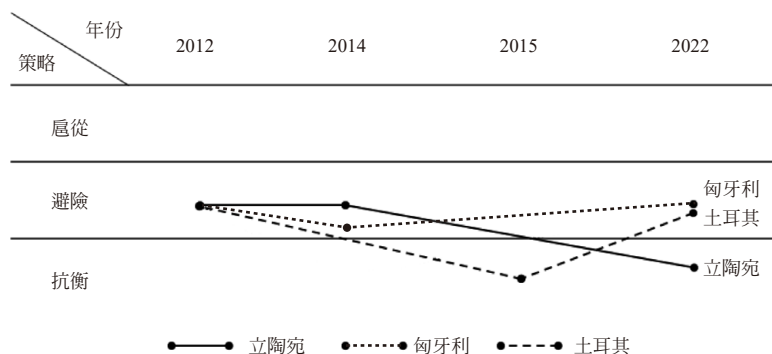
立陶宛：類型八抗衡策略

匈牙利：類型五全方位擴大經濟交往策略

土耳其：類型一與所有強權友好策略

最後我們再把立陶宛、匈牙利、土耳其三國自2012年至2022年、為期10年間的策略選擇發展以圖示方式表達，可得出下列路徑演變情況：

圖1 立、匈、土策略選擇路徑圖（2012年～2022年）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伍、結論

（一）避險策略的演變路徑：轉出、轉入與校正

本文研究範圍自2012年至2022年的立陶宛、匈牙利、土耳其三國策略選擇，藉此觀察帶路倡議、克里米亞半島危機與俄烏戰爭等幾個重要關鍵時刻對三國策略選擇影響，透過整理發現在沒有爆發重大事件情況下立陶宛、匈牙利和土耳其多採避免選邊站、也就是與各方交好的避險策略，這些國家當下較樂意與強權保持友好關係、願意自俄國進口能源、願意參與中國經濟合作機制。這三國經驗顯示在相對穩定、未有國際結構壓力的情況下，中小型國家對避險策略的接受程度較高。

不過隨重大事件開始出現，三國避險策略開始出現轉變，立陶宛與土耳其首先出現變化，雖然兩國變化原因各不相同（克里米亞半島危機與軍機擊落事件），但這兩國很快地從原先位置進行調整往限縮避險的方向前進，俄國是這兩國抗衡主要對象，兩國都處於避險策略的「轉出」階段。立陶宛自危機爆發後拋棄避險進入抗衡策略，自此再未回到避險策略；與立陶宛不同，土耳其雖在2015年轉向抗衡俄國，不過很快地又轉回到避險階段，匈牙利則在危機最盛時刻遠離俄國，但從未真正以俄國為主要敵人。

第三階段的避險策略發展三國路徑也不相同，土耳其從先前聚焦抵抗俄國的避險策略調整回原先避險策略，這代表土耳其雖一度以俄國為抵抗目標，但安卡拉很快回到全方位的交好策略，這種調整策略是土耳其外交核心所在，國際事件對土國外交政策僅產生些微衝擊、安卡拉反應後便很快地回到原先位置。

匈牙利路徑發展與土耳其相似，匈牙利雖具有歐盟會籍身分、經濟政策很大程度受限於歐盟框架，不過匈牙利的疑歐主義仍盡量保持友好的對俄態度，不僅對俄友好，匈牙利也在同一個時期開展與中國的經貿合作，從其對俄、中雙邊友好的作為來看，是一種深化的避險策略作為。立陶宛第三階段策略變化方向與其他兩國不同，立陶宛第三階段的策略轉型已朝向全然的抗俄策略、並且把對俄政策蔓延至對中政策框架，形成了最強烈的既遠俄又遠中的純然抵抗策略。

（二）影響策略選擇的內、外因素

除了解三國策略轉型軌跡外，本文認為影響三國策略轉型主要因素來自於國家內部與外部環境因素。外部因素、也就是國際重大事件的產生讓中小型國家感受較大威脅、並在面對環境變遷時需要很快地進行回應，我們可以觀察到克里米亞半島危機發生時衝擊很快地蔓延到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衝擊的力量也剛好隨三國國家大小差距而逐步遞減，規模越小的國家感受危機的衝擊越大。此外歐盟制度性因素也是另一個外部因素所在，立陶宛與匈牙利已是歐盟會員國，兩國分屬在歐盟制度下的兩種回應危機的極端作為：立陶宛不僅配合歐盟決議制裁俄國、同時還自主的放大制裁政策內涵、徹底斷絕與俄國的能源關係；匈牙利則盡可能迴避歐盟對俄制裁決議，不僅公開反對歐盟對俄制裁、認為此舉將適得其反、更加激怒俄國，而且也不支持歐盟對俄能源制裁方案、並成功爭取豁免匈牙利參與對俄的石油禁運決議。

2023年10月爆發的以色列—哈瑪斯衝突則是一個重新觀察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三國避險策略轉向的重要事件，當聯合國大會於2024年5月10日表決要求安理會應「積極考慮」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案時，土耳其支持、立陶宛棄權、而匈牙利則持反對意見；如果我們再把這三國態度與美國反對、俄國與中國支持的立場來看，這裡可以發現立陶宛的立場較為模糊不清、土耳其重回親俄路線、匈牙利投票行為轉回與美友好的外交立場，三國避險策略轉型的路徑發展可見一斑。

內部因素是另一個解釋三國策略變化所在，匈牙利Orbán自2010年再度上台擔任總理以來展現鮮明的個人特質，其相對保守的社會價值（反對同性婚姻、強烈反對接受外來移民）、限縮學術言論自由（關閉經常批評Orbán的中歐大學）、行政權獨大（新冠病毒蔓延期間限縮國會角色、強化總理行政權）等各種政策與多數歐盟國家極不相同。相同的內部因素也發生在土耳其，Erdoğan執政初期尚能保有改革做法，取消死刑、推動經濟改革、給予庫德族人較大的自治權力，不過2013年境內出現的大規模反政府抗議運動，Erdoğan施政開始偏向保守，2014年更轉換政治跑道、擔任直選第一任總統後開始整肅庫德族人、並藉由失敗的軍事政變整肅反對派人士，並連帶對法官、記者、出版社進行逮捕或勒令停業，從這一點來看Erdoğan與Orbán相似，都將外交政

策與國內政治地位穩固相聯繫。由於歷史與地緣之故，立陶宛原本就與俄國保持相當距離，自2020年Ingrida Šimonytė出任總理後，立陶宛反俄政策力道不斷加強，這些政策調整體現於軍事與人道經濟等各式援烏措施，以及斷絕與俄國的天然氣交易等，都是立陶宛非常鮮明的反俄作為，如果我們將Šimonytė總理（強烈反俄）和2012年出任社民黨的Algirdas Butkevičius總理（相對友俄）相較，顯示出立陶宛先避險、後轉出成為抗衡的策略選擇表現與國內政治發展有很強烈的關聯。

（三）中國：從定義不明到逐漸清晰的強權形象

對立陶宛、匈牙利、土耳其等國來說，安全的核心關懷都以北約和俄國為主，不過2012年開始16+1與帶路倡議推出後，中國對歐洲國家影響日益深化，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等國初期都顯示出與中國深化交流的政策目標，同時也由於歐洲處於對抗歐債危機與缺乏資金的國際環境，立陶宛、匈牙利與土耳其很快地加入16+1或與中國簽署帶路倡議備忘錄，這些國家初期視中國為資金提供者與經貿合作者，政治關係則未有明確定位。隨中國對歐洲政策引導力道加強與歐洲諸多變局出現後，立、匈、土三國對中政策開始隨之改變：

1. 立陶宛：視中國為區域安全的挑戰者

觀察立陶宛過去10年來的對中政策演變，立陶宛對中政策調適主要在於將中國逐漸視為與俄國同樣的外在強權、將中國逐漸標記為對抗強權，認為中國與俄國在諸多領域的合作升溫將對歐洲安全產生影響，北京將透過經濟、政治、外交與各種強制性手段達成其政策目標，立陶宛不僅應該對中採取強硬的回應方式，更應該對此整合歐盟與會員國的對中政策發展，近期立陶宛發布的印太戰略便呈現出此種看法。不過立陶宛內部也有另一種恢復對中政策的聲音存在，這就是2024年5月立陶宛總統選舉的主軸之一，競選連任的總統Gitanas Nausėda拋出希望改名臺灣代表處的名稱，但同一時間在立陶宛內部幾乎未曾聽聞希望恢復與俄國的能源進口。顯然立陶宛有時候將中國與俄國等量齊觀、但有時又希望制定出對中與對俄的不同政策框架、以此享受與中國交往的經濟紅利，這些細微處都說明了中國雖與俄國相異、但亦是影響歐洲安全的重要存在。如果我們再把立陶宛—中國—臺灣三邊關係放在一起，那麼就可發現立陶宛跟中國的經貿關係中，因立—臺雙邊經貿關係升溫而使得立陶宛遭受中國抵

制，導致該國對中國出口大幅下滑，這個現象也證明了立陶宛避險策略難以為繼的原因所在。

2. 匈牙利：視中國為避險策略的重要夥伴

匈牙利的中國意象與立陶宛純然不同，匈牙利過往採取典型的避險策略，除參加中國帶路倡議外，匈、中升溫的經貿與投資關係在歐洲相當受到矚目，2017年其與中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進一步將兩國關係推升至新的合作層級，兩國的政治合作空間越來越寬廣：匈牙利2021年成功阻擋歐盟批評中國對香港實施新國安法的聲明、2023年2月也率先支持中國外交部提出的俄烏戰爭和平計畫，說明匈牙利認為中國是一個能與之高度合作且維繫避險策略的重要角色。

3. 土耳其：保持低層交往、模糊中國意象

土耳其的中國意象仍保持在模糊階段，中國與土耳其2010年簽署戰略夥伴關係，雙邊低層政治的合作如核能、衛生等協議也持續進行，雙邊經貿關係也在平穩中緩步增長，不過土、中雙邊的政治關係卻存在若干齟齬，新疆議題困擾土、中關係甚久，雙方對新疆維吾爾人權益、分離主義與反恐行動、以及敘利亞內戰的看法並不一致，彼此在這些議題上保持警戒，因此中國雖強化對土政策引導，但土耳其始終保持有限度的雙邊合作關係，降低中國在土耳其的影響力。從土耳其今年6月8日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燃油及混合動力車加徵40%關稅、以及先前已對中國電動車加徵40%關稅來看，兩國經貿關係似趨向緊張方向發展。

4. 影響歐洲安全的境外行為者

俄烏戰爭自2022年爆發以來，若干歐洲國家視中國為俄國潛在盟友，然中國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與俄國締結重要政軍協定，不過總體來看，中國已成為繼美、俄兩國後影響歐洲安全重要的境外行為者，歐洲相關國家未來制定政策時將會更留意中國與俄國、中國與美國的互動關係。本文透過檢視立陶宛、匈牙利、土耳其等三國策略選擇，觀察這三國在多重強權環伺的國際環境中如何調整策略以回應變局，期望以此了解未來更多國家外交策略可能變化。

（收件：113年1月22日，接受：113年6月19日）

The Study of Complex Hedging Strategies: Security Policy Choices of Lithuania, Hungary, and Turkey

San-Yi Y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bstract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constitute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se states possess distinc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references; hence, examining their strategic choices provides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study is characterized by several key features. First, it focuses on European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through the case studies of Lithuania, Hungary, and Turkey. These countries are situated on the geopolitical frontlines of the current East—West divide. By observing their policy behavior, we gain insights into the strategic choices made by states located in the fault lines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Europe and Russia. Second,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China in Europe has added complexity to the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While European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have traditionally navigated a strategic landscape shaped primarily by European and Russian power,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n external actor necessitates the reevaluation of conventional models. As the number of major pow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creases beyond two, the hedging strategies adopted by smaller states tend to become more complex, prompting a reconsideration of exis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is study presents several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First, contrary to earlier scholarship suggesting limited room for hedging once a small state joins a military alliance, the empirical cases reveal that hedging remains a highly visible and viable strategy. Within the spectrum of balancing, bandwagoning, and hedging, the latter continues to attract attention due to its aim to avoid direct conflict while preserv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 distinctly moderate strategic orientation. Even within alliance structur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states may pursue hedging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Second,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Lithuania, Hungary, and Turkey exemplify three distinct modes of hedging: external disengagement, alignment, and recalibration, respectively. These modes illustrate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hedging strategies in a multipolar context. Finally, the paper highlights China's growing role as an emerging external actor in European security. As China becomes a significant third force alongs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how these powers mutually adjust and how European states perceive China will be critical to the future trajectory of European security.

Keywords: Complex Hedging Strategy, Lithuania, Hungary, Turkey

參考文獻

- 吳玉山，1997，《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臺北：正中。Wu, Yu-Shan. 1997. *Kangheng huo huzong: liangan guanxi xinquan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ross-straits Relations Revisited]*. Taipei: Cheng-chung.
- 吳雪鳳、曾怡仁，2017，〈中國與土耳其新地緣政治經濟關係下之合作〉，《政治學報》，64：41-74。Wu, Sheue-feng and Dzeng, Yi-ren. 2017. “Zhongguo yu tuerqi xin diyuan zhengzhi jingji guanxi xia zhi hezuo” [Cooperation under China and Turkey's New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41-74. <http://doi.org/10.6229/CPSR.2017.64.03>
- 吳崇涵，2018，〈中美競逐影響力下的臺灣避險策略〉，《歐美研究》，48（4）：513-547。Wu, Chong-han. 2018. “Zhongmei jingzhu yingxiangli xia de Taiwan bixian celyue” [Taiwan's Hedging Strateg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S-China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EurAmerica: A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48 (4): 513-547. [http://doi.org/10.7015/JEAS.201812_48\(4\).0002](http://doi.org/10.7015/JEAS.201812_48(4).0002)
- 吳玉山，2023，〈如何站位？俄烏戰爭與戰略抉擇〉，《思想》，46：317-326。Wu, Yu-Shan. 2023. “Ruhe zhanwei? ewu zhanzheng yu zhanlyue jueze” [How to Stand?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and Strategic Choices]. *Sixiang*, 46: 317-326.
- 陳麒安，2014，〈重新檢視瓦特的聯盟理論〉，《問題與研究》，53（3）：87-115。Chen, Chi-an. 2014. “Chongxin jianshi wate de lianmeng lilun” [An Reappraisal of Walt's Theory of Alliances]. *Wenti Yu Yanjiu*, 53 (3): 87-115. DOI: 10.30390/ISC.201409_53(3).0004
- 陳麒安、吳崇涵，2022，〈南韓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避險戰略〉，《問題與研究》，61（2）：1-49。Chen, Chi-an and Wu, Chong-han. 2022. “Nanhan zai meiguo yu zhongguo zhijian de bixian zhanlyue” [South Korea's Hedging Strateg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nti Yu Yanjiu*, 61 (2): 1-49.

DOI: 10.30390/ISC.202206_61(2).0001

- 張凱銘，2020，〈川普政府時期的美國國家網絡戰略之研究：從威脅平衡理論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21（1）：107-170。Chang, Kai-ming. 2020. “Chuanpu zhengfu shiqi de meiguo guojia wangluo zhanlyue zhi yanjiu: cong weixie pingheng lilun fenxi” [Study on the U.S. National Cyber Strategy in the Trump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lance of Threat Theory]. *Prospect Quarterly*, 21 (1): 107-170.
- 鄭端耀，2003，〈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究》，42（2）：1-21。Cheng, Tuan-yao. 2003. “Guoji guanxi gongshi yu shoushi xianshi zhuyi lilun zhengbian zhi pingxi” [Analytical Appraisal of Defensive vs. Offensive Realism]. *Wenti Yu Yanjiu*, 42 (2): 1-21. DOI: 10.30390/ISC.200303_42(1).0001
- 蔡明彥、張凱銘，2015，〈「避險」戰略下大國互動模式之研究：以美中亞太戰略競合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16（3）：1-68。Tsai, Ming-yen and Chang, Kai-ming. 2015. “Bixian zhanlyue xia daguo hudong moshi zhi yanjiu: yi meizhong yatai zhanlyue jinghe weili” [Interaction Patterns of Great Powers under “Hedging”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U.S.-China Strategic Coopeti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rospect Quarterly*, 16 (3): 1-68.
- 薛健吾，2016，〈抗衡或扈從：14個歐亞國家對俄國外交政策選擇的再檢視〉，《東吳政治學報》，34（3）：121-178。Hsueh, Chien-wu. 2016. “Kangheng huo huzong: 14 ge ouya guojia dui eguo waijiao zhengce xuanze de zaijianshi” [To Balance or to Bandwagon? Revisiting the Fourteen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NIS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toward Russia, 1992~2009].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 (3): 121-178.
- Ananicz, Szymon. 2014. “Turkey on the Russi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Crimea.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OSW)*.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14-03-05/turkey-russian-military-intervention-crimea> (March 5, 2023).
- Anastasakis, Othon. 2004. “Greece and Turkey in the Balkans: Cooperation or

- Rivalry?" *Turkish Studies*, 5: 45-60. <https://doi.org/10.1080/14683849.2004.9687241>
- Binder, David. 2012. "Greece, Turkey, and NATO."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23 (2): 95-106.
- Conley, Heather, Jonathan Hillman, Maesea McCalpin, and Donatienne Ruy. 2020. "Becoming a Chinese Client State. The Case of Serbia."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ecoming-chinese-client-state-case-serbia> (August 8, 2023).
- Demir, Emre. 2023. "Turkey-China Partnership: Is Beijing'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ot Delivering Enough?" *Global Voices*. <https://globalvoices.org/2023/03/15/turkey-china-partnership-is-beijings-belt-and-road-initiative-not-delivering-enough/> (March 15, 2023).
- Devlen, Balkan. 2014. "'Don't Poke the Russian Bear': Turkish Policy in the Ukrainian Crisis." *Norwegian Peacebuilding Resource Centre*. https://ciaotest.cc.columbia.edu/pbei/noref/0031254/f_0031254_25294.pdf (May 10, 2023).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Imports of Natural Gas, Hungary 2021." *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atabrowser/view/NRG_TI_GAS/default/table?lang=en (May 10, 2023).
- Gaber, Yevgeniya. 2023. "One Year into the War, It's Time for Turkey to Reconsider Its Ukraine-Russia Balancing Act." *Atlantic Council*.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turkeysource/one-year-into-the-war-its-time-for-turkey-to-reconsider-its-ukraine-russia-balancing-act/> (March 1, 2023).
- Goncharova, Olena. 2023. "Lithuania to Prepare New Aid Package for Ukraine." *The Kyiv Independent*. <https://kyivindependent.com/lithuania-to-prepare-new-aid-package-for-ukraine/> (October 12, 2023).
- Gruebler, Julia. 2021. "China Connecting Europe?" *Asia Europe Journal*, 19: 77-101. DOI: 10.1007/s10308-021-00616-4
- Güneylioğlu, Murat. 2022. "The Turkey-China Rapproche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RI: A Geoeconomic Perspect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76 (5): 546-574. <https://doi.org/10.1080/10357718.2022.2076805>
- Interesse, Giulia. 2022. "China-Türkiye: Bilateral Trade and Future Outlook." *China Briefing*. <https://www.china-briefing.com/news/china-turkey-bilateral-trade-and-investment-profile/> (August 23, 2023).
- Jones, David and Jenne, Nicole. 2022. "Hedging and Grand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2 (2): 205-235. <https://doi.org/10.1093/irap/lcab003>
- Kuik, Cheng-chwee. 2021. "Getting Hedging Right: A Small-state Perspective."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3: 300-315. <http://dx.doi.org/10.1007/s42533-021-00089-5>
- Kutlu, Ovunc. 2020. "TurkStream Gas Pipeline Launches in Istanbul." *Anadolu Agency*. <https://www.aa.com.tr/en/energy/energy-projects/turkstream-gas-pipeline-launches-in-istanbul/28014> (January 8, 2023).
- Reuters. 2022. "Lithuania Ceasing all Russian Gas Imports for Domestic Needs."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lithuania-ceasing-all-russian-gas-imports-domestic-needs-2022-04-02/> (April 3, 2023).
- Maitra, Debasish, Mobeen Ur Rehman, Saumya Ranjan Dash, and Sang Hoon Kang. 2022. "Do Cryptocurrencies Provide Better Hedging? Evidence from Major Equity Market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62: 1-27. <http://dx.doi.org/10.1016/j.najef.2022.101776>
- Marten, Kimberly. 2017. "Reconsidering NATO Expansion: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of 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1990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 135-161. <https://doi.org/10.1017/eis.2017.16>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2022. "Lithuania's Membership in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https://kam.lt/en/lithuanias-membership-in-nato/> (August 8, 2023).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2023. "For a Secure, Resilient and Prosperous Future, Lithuania's Indo-Pacific Strategy." <https://>

- urm.lt/uploads/default/documents/ENG%20Strategy.pdf (September 6, 2023).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1949.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Washington D.C.- 4 April 194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17120.htm (September 19, 2023).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14. "Prague Summit Declaration."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9552.htm (September 6, 2023).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2. "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1991-1997)."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69344.htm (September 6, 2023).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2023. "NATO'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East of the Alliance."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136388.htm (September 6, 2023).
- Oba, Mie. 2019.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sian Regionalism: Institutional Hedging in an Uncertain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8 (2): 125-140. <https://doi.org/10.1080/24761028.2019.1688905>
-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2023. "Hedge."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hedge> (September 10, 2023).
- Park, Ausraand and Gerda Jakstaite-Confortola. 2021. "Small State Status-Seeking: Lithuania's Foreign Policy Status Aspirations." *Europe-Asia Studies*, 73 (7): 1279-1302. <https://doi.org/10.1080/09668136.2021.1919291>
- Pavličević, Dragan. 2018. "'China Threat' and 'China Opportunity': Politics of Dreams and Fears in China-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3): 688-702.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18.1458057>
- Republic of Türkiy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19. "Relations between Türkiy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s://www.mfa.gov.tr/relations-between-turkey-and-the-russian-federation.en.mfa> (September 6, 2023).
- Ringsmose, Jens and Mark Webber. 2020. "Hedging their Bets? The Case for a European Pillar in NATO." *Defence Studies*, 20: 295-317. <http://dx.doi.org/10.>

1080/14702436.2020.1823835

- Reuters. 2023. "Russia's Gazprom to Supply Extra Gas to Hungary and China This Year."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russias-gazprom-supply-extra-gas-hungary-china-this-year-2023-10-22/> (October 22, 2023).
- Sadecki, Andrzej. 2014. "Hungary's Stance on the Ukrainian-Russian Conflict."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OSW)*.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analyses/2014-05-21/hungarys-stance-ukrainian-russian-conflict> (May 21, 2023).
- Snyder, Glenn. 1990.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1): 103-123.
- Song, Wen-long. 2022.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Narrow Spaces for Strategic Hedging in New Europe."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25 (1): 22-39. <https://doi.org/10.1080/19448953.2022.2129324>
- Strozewski, Zoe. 2022. "EU Allows Russia to Move Goods Through NATO Nations After Putin Warning." *Newsweek*. <https://www.newsweek.com/kaliningrad-russia-european-commission-sanctioned-goods-transit-nato-countries-lithuania-poland-1724414> (July 13, 2023).
- Strycharz, Damian. 2020. "Dominant Narratives, External Shocks, and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Crime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9 (2): 133-144. <https://doi.org/10.1080/10758216.2020.1813594>
- Sushentsov, Andre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20. "The Tragedy of US-Russian Relations: NATO Centrality and the Revisionists' Spira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7: 427-450. http://dx.doi.org/10.1007/978-3-031-23364-7_8
- Tessman, Brock and Wojtek Wolfe. 2011. "Great Powers and Strategic Hedging: The Case of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3 (2): 214-240. <https://doi.org/10.1111/j.1468-2486.2011.01022.x>
- Tidey, Alice. 2022. "Hungary Agrees Deal and Lifts Veto on €18bn EU Aid Package for Ukraine." *Euronews*. <https://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2/12/13/hungary-lifts-vetoes-on-ukraine-aid-and-corporate-tax-to-lower-frozen-eu->

- funds (December 13, 2023).
- Turcsanyi, Richard and Eva Kachlikova. 2020. "The BRI and China's Soft Power in Europe: Why Chinese Narratives (Initially) Wo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9 (1): 58-81. <https://doi.org/10.1177/1868102620963134>
- Üncel, Ahmet Eren and Oğuz Güner. 2021. "17+1 Cooperation: An Overall Assessment on China-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4 (2): 46-67. <https://doi.org/10.51763/UID.996619>
- Valiyev, Anarand and Narmina Mamishova. 2019. "Azerbaijan'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Russia since Independence: Compromise Achieved."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19 (2): 269-291. <https://doi.org/10.1080/14683857.2019.1578053>
- Végh, Zsuzsanna. 2015. "Hungary's 'Eastern Opening' Policy toward Russia: Ties that Bind?" *International Issues &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24 (1-2): 47-65.
- Wachs, Johannes and Lise Herman. 2014. "Hungary's Reaction to the Ukraine Crisis Illustrates the Tensions within Fidesz's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ahead of April's Elections." *European Politics and Policy*. <http://bit.ly/1gKm3DI> (March 20, 2023).
- Walt, Stephen.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 Wilks, Andrew. 2022. "As Russia's War in Ukraine Drags on, Turkey's Role Expands." *Al Jazeera*. (November 15, 2023).
- Xinhua. 2021. "Hungarian PM Receives Injection of China's Sinopharm Vaccine."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2/28/c_139773652.htm (October 17, 2023).
- Yeşilbursa, Behçet K. 1999. "Turkey's Particip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ommand and Its Admission to NATO, 1950-52."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5 (4): 70-102. <http://dx.doi.org/10.1080/00263209908701287>